

<中国語訳>

『近代女性学の道程——性差と表現——』

—第四章 女としての失敗と成長：愛することと書くこと—

作者：水田 宗子

翻訳：呉 小莉\*

---

\* 城西国際大学専任講師・研究員

女性的成长和失败：爱与创作  
选自  
《现代女性文学的历程：性差与表现》

作者：水田宗子  
翻译：吴小莉

## 第一节

渴望男性爱的女主人公们，不仅想获得婚姻中的幸福，而且寻求着自尊心和自我意识。她们不得不在找女婿的竞争中付出高昂的代价而最终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

无论对女人来说还是对男人来说，爱是个人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然而，能把爱与具有社会保障的婚姻区分开的女主人公却非常之少。当恋爱没有达到结婚的目的时，女性的自尊心就会受到伤害，自我评价的标准亦会降低，随之陷入丧失自我的境地。宫本百合子最初的代表作《伸子》就是一部反映通过婚姻认识失败的爱情而成长的反映女性内心世界的小小说，亦可以说是一部以离婚为主题的教养小说。

佐佐伸子是在充满了大正年间中产阶级思想矛盾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她的父亲既是一位在英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建筑师，又是深信日本近代化的典型的知识分子。他的家庭教育以人道主义和精神自由为主；在培养子女以在社会上的功成名就与家族繁荣为目标的同时，又将束缚个人的封建思想作为铺垫。这种近代日本式的矛盾，在其长女伸子的婚姻问题上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伸子的幼年早慧被其父母承认。她没有受到作为女孩子的任何束缚，自由自在地成长起来。由于其母怀有盼望女儿在文坛上早露锋芒成名成家的虚荣心，非但不反对反倒鼓励女儿写作。因此伸子的赴美游学，也含有其母教育投资的意味。然而，伸子与步入中年仍未功成名就的寒酸学生佃的结合，令其父母大失所望。诚然，伸子并没有因为结婚而放弃成为作家的志向。而她与佃的婚约是以不妨碍她成为作家不生儿育女为前提的。

佃与伸子的结合之所以遭到伸子父母的强烈反对，这不仅是因为佃与伸子不般配，而且因为做为佐佐家的女婿佃的出身亦不够门当户对。这个来历不明，一辈子也无法出人头地的中年男子，与具有成为名作家的才华的女儿相比，在“身份”上差距太大。

而伸子却爱得神魂颠倒。自从天真地陷入佃的情网之后，便不能自拔。她对佃的爱是对其父母顽固的门户观念、封建婚姻意识乃至中产阶级的虚荣心的强烈反抗。对伸子而言，不输给父母是绝对必要的；为了自由和独立，与自己选择的男人结婚（即使是佃这样的人）也是绝对必要的。象伸子这样的恋爱结婚，正如日本战前所有向往自由的女性，是争取精神独立的一种仪式。

“自由恋爱和自由结婚”这类词汇在明治和大正年间的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有魅力的。它唤起了人们对幸福的极大憧憬。田山花袋的《棉被》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其中的一例。特别是对被受社会角色所限制的女性来说，对通往自由的唯一的道路抱有幻想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也只有在恋爱上，女性才感到自己与男性是平等的。

伸子的母亲是一位自我意识很强的女性。她执拗地反对女儿的婚姻，不单单是出于虚荣

心和对于家世的顾虑，而且与其做为女性本身的复杂心理有关。伸子的母亲多计代，是一位在内心深处对恋爱怀有极深憧憬的女性。这在日后她与儿子的家庭教师之间发生的恋情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当比她年少二十岁、浅薄又无诚意的知识青年向她说起自己与妻子之间缺少心灵沟通、如梦一般的轻浮话语时，立即掀起了这位年过五十的明治女性潜在的对恋爱向

伸子对自己母亲这一过失的谅解过程，实际上是对自身恋爱错误的认识过程。的确，伸子在步入婚姻生活不久便认识到，佃不是那种值得她为之进行那样激烈的斗争并付出牺牲为代价的那种人。于是，随着对佃的不断失望，进而产生了对婚姻的失望。正如宫本百合子在日记中写的那样：伸子过分强调“精神的结合在婚姻生活中的重要性”。她在工作中得以充分燃烧并充实了自我意识，亦同样期待在婚姻中得到同样的充实和燃烧。

热情的伸子对百无聊赖且又无心做学问、只是将自己终日关在家中的佃焦虑万分。以至感到“从本质上嫌恶”他。伸子全身心地爱着这个所谓丈夫的男人。那种爱，是向外沿伸的自我的满足，即期待它支撑自己的事业。伸子的恋爱以及婚姻观是非常理想主义的。这也是宫本百合子一生所固守的信念。

对伸子来说，结婚是恋爱的发展又是恋爱的永远。婚姻是敞开自我而使自己得以成长的场所。伸子希望通过恋爱，亦即通过与男性的性爱，来丰富自己改变自己。作为佃不仅必须

然而恰恰相反，对佃而言，伸子应该在婚姻生活中回避这种自我冲突。即使佃不认为结婚是恋爱的终点站，也应该认为家庭是面向社会发展，安定自我的修养圣地。佃并没有期待伸子通过与自我冲突而改变自己，乃至得以成长。在佃看来，伸子的所谓献身，只不过是回避与伸子的自我冲突而已，而恋爱也不过是向白我不存在的婚姻的转变罢了。佃只不过得到伸子从成长的斗争中以献身为名撤退的专利罢了。

伸子希望婚姻生活确实能成为自我意识供给的源泉和补充，然而对伸子而言，与佃的婚姻生活却使她的自我常常得不到燃烧，陷入了不满状态，有如地狱。以至于伸子断言，婚姻会使女性丧失人性。

伸子渴望从追求爱情中获得自我充实、精神交流等供给工作的热量。同时，也憧憬做为女人的幸福。在百合子的心目中，这种做为女人的幸福，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百合子始终追求做为女人普遍应有的自我需求和做为女人应被满足的性要求。伸子所谓的家庭幸福，是指人性的满足和封闭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性满足。为了社会意义上的自我充实和事业的发展而拒绝生儿育女的伸子也认为生孩子本身是私生活中性满足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佃并没有深入地思考性的应有状态以及有关男女性爱之事。伸子尤其为佃在感情和情操上缺少阳刚之气而苦恼。这是由于人性贫乏所造成的。可以认为，在佃与伸子的生活中，肉

体方面和精神方面都非常贫乏。当伸子觉悟到与佃的婚姻生活带不来自我充实、精神沟通、对事业的帮助以及作为女人的幸福时，伸子并没有像其他文学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一味责怪佃的性格。伸子反复地思考了性爱、生儿育女、婚姻制度、乃至女性的成长等人生问题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离婚，这也是为了警示后人。

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伸子来说，事业和家庭，即自我的社会性发展以及对封闭的异性爱的充实是女性最重要的课题。伸子认为，女性为了人性成长要让这两方面并存，而且必须对二者加以充实。伸子肯定了女性内心所怀有的对充满快乐的幸福家庭生活的渴望。当她认为那种渴望是人性所必需时，伸子提出了二十世纪初女性主义的一个矛盾课题，即事业与家庭二律背反的关系，并寻求解决该问题的方法。

伸子认为夫妇的结合是为了使两个人“更加丰富并且更加广泛”地成长。此外，在两个人之间纵然没有爱的结晶——这一必须被照看的弱小生命，理想的婚姻同样能够成立。然而，若已婚女性负起做为主妇的全部责任，就不能保证艺术事业的成功，因为艺术事业要求个人的全面投入和燃烧。伸子意识到，目前日本现状不可能让主妇和艺术家并存。因此，伸子踏上了离婚之路。伸子为了成为最自由地保护自己的艺术家下决心放弃做主妇的资格。在离开了佃之后，就没有人能够再用女人、妻子一类的理由来责难她了。

然而，如前所述，宫本百合子并不是在家庭与事业之间的二律背反矛盾中主张事业优先主义者，同时，她也并非否定女性作为扮演操持家务及相夫教子的家庭角色的女权主义者。相反，伸子认为与异性相爱并共同生活是女性丰富人性且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成长所不可缺少的。对“家庭的亮丽面”深信不疑的伸子=百合子来说，即便宣布自己不想生孩子，也认为，

当伸子意识到，包括事业和爱情的婚姻生活妨碍了个人的全面发展时，才决定与佃离婚的。这种极其重视人性成长的观点，亦可以被称为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者。

伸子具体考虑离婚，是在遇上了热衷于事业且身心独立的女性吉见素子之后。在与佃离婚后，如《两个院子》中所述，伸子与素子的非肉体之爱支撑了她。然而伸子并没有因为两个人的分手而放弃对肉体 and 异性的爱情生活的信心和憧憬。与素子一起生活，虽然两个人没有肉体上的关系，但在感情上与异性相处同存在着矛盾，伸子受了刺激。在丰富了感情的同时，亦还有被束缚的一面。

《伸子》的新颖之处是以人性成长为基轴，推导出女性的事业与性别角色之关系这一结论。重要的是伸子把男女间的爱情和日常的共同生活，置于热衷于事业这一根本上加以考虑的。伸子把理智与情感的融和、事业与生活的融和作为男女之爱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宫本百合子认为脱离肉体是爱的本源，爱情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绝对信赖的关系之上的，这与历来女主人公向往的浪漫爱情背道而驰。

在《两个院子》这篇小说中，百合子批判了女性暗中养成的对浪漫爱的追求与对挫折感的憧憬。伸子对其母亲多计代的恋爱问题的看法明确地表现出了这种批判意识。

多计代是一位对性欲无知的关在家里的主妇。像纯真无邪的女儿一样毫无防备地向往爱情。深藏着没有得到充分发

散青春的热情，一个接一个生孩子的多计代对成为女主角的向往——对理想化男性的憧憬与现实生活中梦一般的空虚感被经历了结婚离婚的伸子看得清清楚楚。伸子认为，多计代那熊熊燃烧的生命受到对方的“卑鄙人格及情感的冷淡”沉重打击的问题所在是母亲自己没有认识自己，并缺少通过恋爱使人性得到成长的认识。

多计代是一个从丈夫身上得到物质和肉体的满足而终日无所事事的中年妇女。她没有认清年轻男子的浅薄性格，却为之燃烧了自己的情爱。当恋爱结束时，她流露出了对男人的蔑视。与其说多计代受了刺激，不如说她对生命力燃烧的热情消失了。多计代用戴着闪烁着美丽光泽的戒指的手，为佐佐乡下贫穷的农家送去改制过的旧衣服，又回到了不愁吃喝、对自身又缺乏认识的主妇的生活中去了。

放弃爱和成长是憧憬浪漫爱情而受其伤害者得出的典型结论。而伸子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失败而绝望或放弃对爱的追求。

离婚小说的代表作《伸子》，与其说描写了随着离婚而来的烦恼及复杂的心理障碍，不如说提倡离婚在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必要性。百合子丝毫没有从人性的立场动摇是因为她有爱的理想。

伸子在经历了自我反省以及对佃的怜悯、憎恨、留恋等坎坷的内心苦恼之后，最终通过离婚从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了。为了更丰富更广大的人生目的，即作为人、作为艺术家的成长并获成功，这点应给与完全的肯定。从恋爱结婚的自由步入分居、离婚的自由，这是伸子所以成为新女性形像的原因所在。

《伸子》这部小说的背景是以巨大的历史潮流为铺垫的。但它着眼于伸子的苦恼和成长等个人经验的层次，特别是着眼于她做为女性的经验而展开的。而伸子的成长与历史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却是以后的事。

## 第2节

在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的美国，西露比尔·普拉斯的小说《志愿自杀》风靡一时。这是一部从女性的成长及自我充实的观点出发，深刻思考婚姻的小说。这部以现代美国社会中“女性教育”为主题的《志愿自杀》是青春教养小说的杰作之一。等待女性青春结束的是结婚。而闪光的青春和灿烂的恋爱都是以婚姻为终点的。正如上一节所提到的，因找女婿失败的女性的青春暗淡无光。可以认为，对女性来说，结婚是青春期成长的目标。

《志愿自杀》中的主人公艾丝塔·格林伍德在拒绝了世俗的美满婚姻之后，不得不对自己的青春意义及人生目的等问题进行全面反思。艾丝塔放弃被保护的形像，选择了个人生存的方式。因此，她的人生的意义就必须靠一个人去探索了。

这是与美国社会以及现代文明的正面交锋，亦是超越婚姻、对生存意义的探索。当艾丝塔战败，陷入疯狂的深渊时，敌人不全是男性，其中还包括现代文明。这一点在小说的开头象征性地描述过。

“那是个阴森森的潮湿且闷热的夏天。在罗森帕古夫妇被绑在电气椅子的夏天，我正好在纽约，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有关迫害一事，我也一无所知。虽然一想到电击死亡便感到恶心想吐，但看报却只读与此有关的报道。新闻标题像戴着眼镜的大眼睛，无论在街头巷尾，还是在恶臭的地铁入口，死死地盯着我。虽然与我毫无相关，但只要活着就不得不考虑这燃烧我神经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这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以苏联间谍的名义而被处死刑的罗森帕古夫妇的死，象征着现代社会对个人的迫害。同样，也意味着艾丝塔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迫害。这一点日后艾丝塔在精神病院里被强迫接受电击治疗时明确地表现出来。潮湿闷热的纽约之夏，所含有的威胁的气氛，已经穿透了艾丝塔的神经并燃烧在其生命之中。

艾丝塔是成绩优异、享受奖学金的东部一精英女子大学的学生。她已经发表了一些很出色的诗歌作品，并指望将来做个诗人。艾丝塔与年轻的美国女性并无两样，对约会和找丈夫极为关心。也就是在那个夏天，艾丝塔从全国范围内被选拔出来，做为女性杂志《马道莫尔摘录》的特约编辑来到了纽约。

通过调查1953年的《马道莫尔摘录》杂志发现，当时有十名左右的学生编辑。她们做为“追踪男人者”，穿着典型的学生制服：套头毛衣和裙子。一只手拿着香槟杯子，微笑着并排而立。西露比尔·普拉斯虽是个显得有些笨拙的高个子，却满面笑容地站在后排。

艾丝塔以成为诗人为奋斗目标。编织着自由而独立的人生梦想。同时，并没有下决心放弃婚姻这一所谓“女性的成功”。对于五十年代美国中产阶级教育出来的女性来说，家庭幸福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在帕迪·富理顿的《女性神话》中有过如实的描写。艾丝塔从约会（找对象）和作为诗人所受教育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不能接受作为性的对象，或者是成为主妇而存在的事实。

艾丝塔的男朋友是典型的美国精英青年。即使在与艾丝塔登记结婚时，也还是断言“诗歌不过有如废纸”。在纽约，艾丝塔受到了嫌恶女性的某富翁以钻石为诱饵的暴行。

现代美国文明是具有破坏性的机械物质文明。同时，美国是男性力量公开操纵的社会。

因此，艾丝塔对文明的嫌恶与对男性的嫌恶，以及对具有“生育性”的女性的嫌恶很难区分开来。经医科学学生恋人的介绍，艾丝塔开始对男性的身体、生育以及婴儿的性功能感到极端厌恶。随着对婚姻和对性的厌恶，艾丝塔进而丧失了对爱的信任。她之所以一心想摒弃处女，是因为想从把爱和婚姻纠缠在一起的浪漫爱的神话中将自己解放出来。而那一体验以出血过多而告终。可以说这也是遭受迫害的象征。

普拉斯给女人下了这样的定义：女人是男性的受害者，亦是现代物质文明的牺牲品。这反映在《志愿自杀》的开头。以核战争为象征的残忍的文明的威胁，在普拉斯的诗作中则表现为男性的破坏性的威胁。比如在他的名诗作《父亲》里，父亲既是医生、教师，又是纳粹、恶魔。艾丝塔的成长是通过对男性性暴力的残忍性和不毛性的认识，发现文明社会的核心同样具有残忍性。不经过成人仪式便不能达到目的。

做为作家的伸子深信通过放弃婚姻，便会获得广大而丰富的成长机会及幸福，而艾丝塔没有这一手段。她虽然从男性的性破坏中逃脱出来了，但更大的文明的破坏力却等待着这位诗人。她被囚禁在精神病院里，这和被关在路森帕克的辛格辛格监狱里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意味着精神及心理的封闭。逃向死亡，即企图以自杀的方式获得自由而告失败的艾丝塔当然是被幽禁在〈贝鲁加〉里了。

艾丝塔通过男性的性和文明的残酷性深深地认识到，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在给予生的同时，她的自杀没有明确地表示出对自然的反抗。她不得不在极端绝望中与〈存在的虚无〉斗争到底。

同样是通过女性经验和存在的虚无进行针锋相对的主题，也曾在琼·黛代昂的《顺其自然》中得以表现。其作品中的主人公玛丽亚，在经历了结婚、坠胎和离婚等做为女人的失败之后，最终认识到，自己虽然是女演员，但在男人眼里不过是性的对象而已。然而，这与美国梦破灭后父亲的狂气和象征文明的牺牲品的先天患有脑障碍的自己孩子的狂气等类似。玛丽亚自身的狂气是由于拒绝做为女人之后失去了自我所造成的。它和居住在米莎伊鲁基地的某个蛇栖息的沙漠，对无论怎么清扫也扫不掉被风沙吹到门廊上堆积起来的砂子而产生的恐怖一样，都是对虚无的恐怖。

玛丽亚和艾丝塔同样，对被男性的性支配的文明充满了敌意。因为这一文明将女性的才华撕得肢离破碎，象破布似的被弃之于荒野。这已经超出了女性的领域，抵达了存在的领域。伸子对于生存这一现实是人成长的场所深信不疑。虽然后来宫本百合子强调男女之间爱的裂痕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但在《伸子》阶段，似乎相信社会现状和生活环境是刺激并供给人成长的精神食粮。

伸子相信世界，相信世人。她看上去像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者。而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玛丽亚，已经不能相信世界或人间这一现实，并以两者为生存的依据而成立。两个人

都看到被日常生活所支撑的生存的虚无，也看到了还原到本来物质存在的虚无的真相。对于她们来说，事业和生活、理性和情感相融和的理想仿佛是世俗的梦想。正如对诗和戏剧的向往不能挽救她们一样，能够恢复生命意义的艺术创造的权利亦被剥夺了。

对于伸子来说，世界即是一个非常广阔、深奥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又是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场。而对于艾丝塔和玛丽亚来说，世界是充满了威胁的米莎伊鲁基地和蛇所栖息的沙漠，被贝鲁加象环状似地围困起来。换言之，狂气是被迫害的结果；而逃往荒芜的沙漠只是为了·时的狗且偷生。

艾丝塔和玛丽亚在丧失自我之后不能完全恢复，只有从存在的威胁中逃脱而已。由于内心的黑暗和沉默所造成的恐怖的降临，反而回到了充满生命意义的层次上。从这一点来看，狂气反倒成为避难所，成为主人公开始新生的场地。

文学评论家查尔斯·纽曼在评论《志愿自杀》这部小说时曾提到，西露比尔·普拉斯是把女性的意识问题和现代文明的总体的宿命观点文学化的极少数的女作家之一。艾丝塔担负着现代女主人公全新的使命。并认识到，拯救女性就是拯救现代文明。这部教养小说的主人公不在是男性，她拥有全部对付文明苦恼的理智和坚强的心理承受力。

从本质上说，西露比尔·普拉斯是存在主义者。她认为人际关系是自己和他人、受害者和害人者、弱者和强者之间的力量关系。存在意义寄托于恢复个体和生存一对一上。而宫本百合子经常把从现实生活中和历史长河中恢复丧失的自我当做理想。这两者的思想分歧，当然不能认为这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分歧。百合子一直深信现实，并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与现实的关系中。这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如同西蒙·波娃自传中闪光的观点。

百合子认为人在现实生活或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企图发现真实的意义并充实自我，否认脱离抽象的个人和生存。她深信在人际关系中，即使存在着夺取和被夺取、迫害和被迫害的力量关系，被虐待者同士之间亦可能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并能够从人的素质中发现向往正义和自由的爱情。

在破坏文明的力量中，抵抗丧失自我而成为牺牲品。伸子将自己投入历史的洪流中，并企图借助参与创造历史的力量来实现理想。她是宫本百合子塑造的排斥现代主义、主张社会主义的理想形象。伸子通过对犬儒主义、逆说理论以及自虐性的自我破坏进行复仇。从而否定了异化人的精神病理学 - 现代狂气 - 之理论。

由于社会制度的制约，伸子深信人的成长是在历史长河和现实生活中完成的。同时，对人的个性品质深信不疑。这与通过现实和社会这一媒介探讨存在、并在孤独的内心冲突中陷入自我毁灭之地狱的艾丝塔相比，伸子以纯真而清新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艾丝塔始终没有找到挣脱地狱的大门。